

# 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 扶贫实践路径研究

——基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视角

林继富

摘要: 目前我国有 23 个文化生态保护区(试验区),主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整体性保护,其中有 11 个文化生态保护区在民族地区。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与民众生活关系紧密,是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宝贵资源。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目标中就包括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及活跃在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对于推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扶贫”活动中,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扶贫实践路径,极大地推进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有效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使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从外力推动向自我内生性发展转化,进而探索出民族地区民众生活脱贫、脱困走向共同富裕的当代道路。

关键词: 民族地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生态保护区 精准扶贫

DOI:10.13501/j.cnki.42-1328/c.2021.01.013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研究”(16ZDA162)。

作者简介: 林继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目前已有 23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其中 11 个在民族地区。<sup>①</sup> 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聚合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彼此构成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的生活实践和民族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体系。2020 年是中国民族贫困地区脱贫的关键年份,在此之前,我国各级政府和民众积极探索扶贫脱贫的方法,寻找助力民族地区致富奔小康的经济资源、生活资源,其中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经济禀赋强,融入当代人生活的性能好,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系统地实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不断推进过程中,增加、提升民众自我“造血”的生活能力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发展道路。文化生态保护区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扶贫行动,不能够只停留在概念和口号上,而是应该成为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新路径。文化生态保护区

① 2007 年以来,共建成 23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分别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区、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客家文化(闽西)生态保护实验区、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带动村民增收、精准脱贫,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助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民族地区共同走向富裕。基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精准扶贫功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化、旅游化过程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 一、政策保障和实践成效: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资源的资本化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下发了《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作坊的通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下发《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等,这些文件均涵括和论述了“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扶贫”以及“民众受益”的工作部署、工作目标,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及其区域内的非遗扶贫提供了国家政策依据。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考察时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工作方针,随后,习近平结合马克思有关贫困的理论,创新发展新时代我国精准扶贫思想,“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sup>①</sup>我国民族地区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贫困多维化,这就需要我们多方面寻找致贫的原因,改善民族地区民众贫困现象。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贫困人口多,有许多属于深度贫困。比如,迪庆民族文化保护保护区范围所涉的三县市(香格里拉市、德钦县、维西县)均为贫困县,属国家精准扶贫重点“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2015年保护区计有贫困村174个,共有建档立卡户19630户,贫困人口共73998人。针对这种情况,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着力抓好非遗四级名录项目体系建设,依托诸多项目,发动传承人和民间艺人,带动群众大力开展传承培训活动,积极参与文化产业、全域旅游、市场经济等活动,在带来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提升贫困群众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等意识,在扶贫扶志、治贫治愚和扶精神、扶文化等方面有明显的成效,有助于迪庆多民族地区脱贫机制的建立和实践。

武陵山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也是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渝东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等三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所在区域,包括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个地区在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生产性保护和文化品牌建设。比如在政府帮助下,恩施市通过“恩施玉露”制作技艺培训、帮扶贫困户建优质茶园基地、提供优质茶苗、提供就业岗位等实现了400户贫困户脱贫。

2018年以来,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扶贫办支持下,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大力开展“非遗+扶贫”工作,设立了以非遗为中心的扶贫就业工坊,以此振兴传统工艺。截至2020年6月,我国设立了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超2000所,带动非遗项目超2200个,培训了将近18万人,带动近50万人就业、2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sup>②</sup>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非遗+扶贫”以其独特的优势,深度融入非遗传承与民生改善之中,也即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客观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帮助民众改善贫困的一些要素,萃取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华,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遍布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能够带动贫困群众就近就业、居家就业的优势。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不是孤立的,而是聚合其所在区域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形成了谱系性、

<sup>①</sup>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122页。

<sup>②</sup> 马盛德《非遗扶贫,激发乡土文化的创新活力》,《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5日,第8版。

体系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挖掘和利用,将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 二、动能与赋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非遗资源融入扶贫

习近平强调“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sup>①</sup>,引导民族地区民众继承非遗传统中勤劳致富、不断进取、克服困难、战胜贫困的美好品德,重视提高民族地区民众贫困对象的文化素质,增强贫困地区民众走出贫困、走向富裕的能力,继承延续民族地区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生活、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实践能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确定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即在“保护为主”的前提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大程度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合理利用”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扶贫能力,扩大其影响力,使其不仅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得到确认、尊重,而且成为民众改善生活、摆脱贫困的重要资源,有效地促进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从目前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情况来看,其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改善民众生活、实施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实践方式方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经验,并且在扶贫方面具有潜藏的动能。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管理机构应当依托区域内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态资源,开展文化观光游、文化体验游、文化休闲游等多种形式的旅游活动。”<sup>②</sup>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整体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非遗名录、传承人体系,还是与非遗有关的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终极目的就是保护好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文化传统、生活传统,提高文化生态保护区民众的生活质量,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因此,将非遗作为旅游资源推动特色旅游成为重要的扶贫增收方法。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茂县是其核心保护区域,茂县政府依托羌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了古羌城景区。景区的建设融入了羌族语言、服饰、饮食、建筑、民间习俗、民间艺术、民间工艺、礼仪节庆等内容,建设了生态良好的羌族文化旅游目的地。景区每天向游客表演羌族民歌、羊皮鼓舞、羌笛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更为广大的人群,很好地传承、传播了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使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落在实处,让民众有了切实的获得感。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充分利用旅游城市广场和热门旅游景区景点,依托各类社会群体开展非遗歌舞传承活动,让游客零距离体验迪庆文化之旅的魅力。截至2020年11月,根据迪庆州非遗项目中传统歌舞类项目编排的迪庆州民族广场舞在迪庆州境内已普及推广八套,另有德钦县和维西县根据地域特点编排两套广场舞。迪庆州广场舞文化吸纳了非遗文化中民族民间歌舞的精髓,成为大众日常生活和游客喜爱参与的娱乐活动的重要部分,丰富了迪庆“香格里拉”旅游的内容,且具有浓郁的迪庆多民族文化共享生活的特点。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管理机构应当依托区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8页。

<sup>②</sup>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第1号,2018年12月10日。

域内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态资源,开展文化观光游、文化体验游、文化休闲游等多种形式的旅游活动。”<sup>①</sup>我国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有11个分布在民族地区,随着休闲时代与旅游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旅游已然成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也成为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有效路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旅游结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旅游,从而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模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具体生态空间、文化空间作为旅游目的地,其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就是一个大的目的地,比如来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旅游,就是来这里欣赏独特的地域风光,感受特有的文化传统,以博物馆、展览馆、传承基地、传习所等为旅游空间,观赏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已建设传习中心(州)、传习馆(县乡)、传习所(村)、传习点(村民小组)四级非遗保护传承空间体系,构建保护区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空间,搭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展示的新平台。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13个综合性传习中心,分别为迪庆锅庄传习中心(奔子栏锅庄传习中心、建塘锅庄传习中心)、迪庆热巴传习中心、藏族黑陶烧制技艺生产性保护传习中心、阿尺木刮传习中心、格萨尔重点保护区域传习中心、藏族弦子舞传习中心、尼汝峡谷牧区藏族文化传习中心、三坝纳西族东巴文化传习中心、纳帕海藏族传统文化保护传习中心、傈僳族瓦器传习中心、藏医药(骨伤疗法)传习中心、德钦金属铸造传习中心。以上传习中心建设大都选址在迪庆旅游的重要节点上,成为“香格里拉”全域旅游的重要旅游目的地。

(2)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和活动融入旅游,成为旅游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包括旅游过程中选择适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文化表演,将非遗元素融入到旅游纪念品、旅游特色食品中。截至2019年底,“BMW中国文化之旅”已经先后探访了中国23个省及直辖市和6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累计探访了36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做出了贡献。2020年10月18日,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发起,中国旅游报社承办的“全国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征集宣传”活动入选线路共12条,包括“中国名片”——北京城市中轴线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千里草原风景大道非遗支线、浙西南畲乡非遗技艺体验游、徽文化非遗研学之旅、齐风鲁韵非遗之旅、“屈原昭君故里”非遗之旅、广州老城新活力文化遗产深度游、中越边境非遗之旅、黔东南侗族非遗深度体验游、交响丝路非遗之旅、“涛涛黄河”非遗之旅、喀什民俗非遗主题游等。这些旅游线路都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与旅游深度融合,比如湖北省宜昌市“屈原昭君故里”,包括4A与5A级旅游景区,非遗文化底蕴丰厚,包括端午节、长江峡江号子、兴山民歌、王昭君传说、南曲、长阳山歌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8个,参与非遗展演展示展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50多名。

在迪庆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常年建设“香格里拉非遗之旅”等非遗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探索文旅融合的新思路,“贵州凯里:非遗与旅游融合推动麻塘精准扶贫”等入选“2019非遗与旅游融合优秀案例”。2008年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获批设立,这是中国在民族地区设立的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经过十几年的保护探索,热贡六月会、黄南藏戏、土族於菟、和日石刻技艺等非遗项目,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生态环境,使热贡地区发展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在发展旅游产业方面,保护区积极举办各类大型宣传活动,其中热贡唐卡艺术博览会、热贡文化旅游节、热贡六月会已成为国内知名的文化品牌,保护区还被国家质检总局命名为“全国热贡文化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热贡通过对村镇产业、民俗、工艺、建筑等区域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传承,重点建设德吉乡村旅游点、热贡唐

<sup>①</sup>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第1号,2018年12月10日。

卡特色小镇等一批特色文旅小镇,形成了产业、城镇、旅游、生态“四位一体”的新型文化旅游与产业融合发展局面。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把改善生态保护区境内民众生活作为第一要务,探索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旅游发展,设立了内容丰富的非遗旅游线路,推动非遗进景区,开发非遗旅游产品,助推青海黄南州旅游业的发展,黄南州旅游总收入从2011年的3.89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23.5亿元。这些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紧密结合,具有示范价值。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管理机构应当挖掘区域内传统工艺项目资源,培养一批能工巧匠,培育一批知名品牌,推动传统工艺振兴;组织开展区域内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传统工艺相关技能培训,带动就业,精准助力区域内贫困群众脱贫增收。”<sup>①</sup>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四级非遗名录作为生活性的实践保护方式,不断赋予非遗产品的附加值,是在不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规律和运作方式,保证其传统性、整体性及核心技艺和传统流程的前提下,传承人以生产基地、传习所或者家庭作坊等单位进行有规模的集体生产。“一些非遗,如传统技艺与传统美术,不仅具有历史性、文化性、艺术性,亦具有生产性,即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要靠人的手工创造来体现,只有在生产实践中,其传统工艺流程、关键技艺等才能实现保护、传承和弘扬。”<sup>②</sup>目前全国设立了100个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这些示范基地许多设立在民族贫困地区和文化生态保护区,以“生产性保护”为核心的非遗生产扶贫模式不仅使非遗得到活态传承和保护,而且在改善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传承人生产出来的非遗产品不仅供当地群众享用,而且作为特色优质产品实现了为群众创收的目的。非遗扶贫发挥脱贫攻坚中“扶志”“扶智”的作用,增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荣誉感、成就感,激发了传承的内生动力。传承人将非遗技能作为谋生的手艺,政府或企业为他们提供生产条件,一方面传承传统产品样式,另一方面研发新型产品。

同仁的吾屯、年都乎、加查玛、郭麻日、尕萨日等村落的村民,开展了唐卡、堆绣、泥塑、石刻等产品的生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销售成为村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黄南州出台《金融支持热贡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公司+艺人”的发展模式,为国家级、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及民间艺人贷款5000余万元,为了让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优秀传统非遗惠及更多的村民,政府组织对贫困群众进行非遗技艺的专项培训。吾屯村尕藏是非遗传人,他组织了100多位贫困艺人到省外进行彩绘、泥塑、壁画等创作,人均年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经统计,从2011年至2019年,黄南州文化从业人员从1.31万人增加到3.38万人,文化产业营业收入从2.4亿元增长到11.2亿元。

为了确保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唐卡产品生产性保护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其注册了“热贡”、安多唐卡、尕藏牌唐卡、仁俊泥塑等系列商标及非遗产品设计专利;启动了热贡艺术品等级评价与质量检测工作和热贡唐卡质量追溯体系、唐卡二维码身份识别信息设置工作,实现了“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责任可追究”。这些均为热贡艺术生产性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也成为人工唐卡艺术走向外地的信誉保障。

传统工艺工作站的设立,是“生产性保护”理念的重要体现。2016年以来,面向贫困地区,文化和旅游部陆续设立十余个传统工艺工作站,帮助贫困地区传统工艺企业和从业者提高产品品质,培育品牌,拓展市场。黔东南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了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通过发现贵州贫困地区具有发展潜力的传统工艺传承人,将其作为带头人进行重点培养,带动当地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吸引

①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第1号,2018年12月10日。

② 马盛德《非遗扶贫,激发乡土文化的创新活力》,《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5日,第8版。

更多年轻人投入到传统工艺保护与传承中来。

从2017年开始,国家文化与旅游部重点支持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非遗传承人参与研培计划,以“强基础、增学养、拓眼界”为目的。研培学员通过培训不仅提高了传承实践能力,而且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如贵州黔东南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2017年上半年以“传承人+合作社/公司+农户”模式创业的就达225家,年销售收入逾7.5亿元,同时,优秀学员返回当地培训新学员并带动贫困人口就业5000余人。这些举措实现了文化生态保护区传承人从“指尖技艺”变为“指尖经济”的转换,许多传承人对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作、制作,其产品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审美趣味,满足了民众的生活需求,有效激发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内生动力,推进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充分认识保护迪庆文化多样性生态空间的重要性,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将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生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生产性保护,处理好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如藏族黑陶、木碗制作、藏族金属铸造、藏刀制作、酿酒技艺等被列入生产性保护对象,纳入生产性保护基地进行传承。这些生产性保护项目可以在市场上求得生存。政府生产性保护措施的实施提升了这些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以非遗的生产性方式保护赋予传承人自主性、自觉性的文化意愿与生活功能,并且在多方合力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人民的生活,进入传统和新的市场,不仅使非遗传承人脱贫解困,而且带动了区域内人民的脱贫致富。

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现有各级非遗名录项目330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257名,在全国各地开设了200多家热贡艺术窗口,形成了教学培训、创作生产、展示收藏、宣传研究等多功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实践活动。精选一批与传统活动一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舞台开展演出活动,不仅极大地激活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活力,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也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传承人收入增加,改善了传承人的生活。黄南藏戏是藏戏的重要支系,黄南藏戏艺人结合黄南藏传佛教寺院壁画人物形态,寺院宗教羌姆、民间舞蹈及藏族日常生活动作等形成了黄南藏族独特的艺术风格。20世纪80年代,青海省藏剧团在黄南藏族自治州成立,展演的《意乐仙女》《藏王的使者》等剧目,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受到现代化生活影响,出现了黄南藏戏剧团减少以及艺人老龄化等问题。黄南藏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得到快速发展。2008年,热贡地区的民间藏戏团只有6家,藏戏演员仅60余人;如今,民间藏戏团的数量已增加到16家,700余名民间藏戏演员活跃在藏戏表演的舞台上,每年演出场次100余场。

2014年由迪庆州举办的第十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幕式《盛典香格里拉》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以迪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迪庆锅庄》《阿尺目刮》《迪庆弦子》等歌舞类节目为中心,以多种色彩为基调,以迪庆民族民间典雅优美、绚丽多姿、独具特色的歌舞乐节目为依托,以民间歌舞优美的旋律、巧妙的组合、独特的艺术展示、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依托各乡镇和传统文化特色村落,积极开展民俗节庆活动,积极鼓励并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如香格里拉市“春节民俗活动”“欢乐香巴拉”“五月赛马会”“尼汝祭山跑马节”“三坝二月八”,以及维西县“阔时节”,德钦县“弦子节”等各地开展的民俗节庆活动,参与人数较多。据统计,保护区每年开展的传统节日活动有50多个。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以非遗为主要内容的节庆活动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杠杆与文化品牌建设的推力。以文化旅游节带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内多元化的演艺事业发展,这些节日庆典的节目以地方性、民族性非遗为主,并且融入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展示,

尽管不是全面的、系统的呈现,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性保护的步伐,也成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当代生活的表达。在非遗文化演出模式中,传承人、民众和外地人员共同参与,增强游览的体验感和参与感,提高文化生态保护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实体空间有限,并且其区域内人民的生活、文化生产、非遗传承均是生活性、情感性的,然而,现代的互联网时代,已经跨越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范围,尤其是探索并建立的“非遗+互联网”模式就是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资源开展的产品生产、营销和流动的模式。这种模式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及平台实现互联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准扶贫的紧密联合,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途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为民族地区贫困家庭增加收入。

互联网拓展了文化生态保护区生活民众的生活范围,也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置于世界文化遗产和多样化的生活世界语境下,活跃了非遗传承传播,加速了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目前国内多家网络平台联合举办“非遗购物节”,依托“电商”为手段,“非遗”进入到熟人亦或更为广大地区的百姓家庭。在抖音短视频、B站等自由、快捷的视频传播平台下,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多、更好的展示机会,一些非遗传承人通过自己制作的视频“圈粉”。现代互联网的非遗传播方式极大地吸引了年轻人,拓展了非遗的传承、传播空间,以更具亲和力的姿态融入到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借助互联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进入到新的生活空间,互联网以直播的方式让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分享、共有的参与式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多地区、多民族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实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所在的福建安溪县以“互联网+非遗+文化”融合发展模式,推动传统工艺与文化创意、休闲产业融合。安溪的竹藤编制工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近年来探索与其他现代工艺相结合,创新发展,开发出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工艺精品,这些竹藤编织产品采取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思路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安溪县家居工艺从业人员达12万人,2017年全行业产值达130亿元。

非遗融入互联网平台,极大地保存和宣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影响力、竞争力,吸引了投资与合作,使依靠传统营销方式、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到互联网的“世界性”场域。引进多方面的资金和多种与此相关的技术进行生产、包装和销售,开展多种方式的共赢合作、共享,既增强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非遗传承实践能力,更促进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动大批生活困难的群众走出了贫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生活实践,以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地方文化品牌名片,具有广泛的民众生活基础。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具有人民性、历史性和辐射性,深化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在生活上、文化上改善民众生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帮助和支持,提供了更多的社会发展耦合点。

热贡意为“梦想成真的地方”,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就将其作为宣传热贡文化品牌。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的唐卡艺术是热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品牌,从13世纪开始,唐卡艺术就逐渐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隆务河畔形成和发展。热贡艺术的品牌建设是以保护为中心,以发展为引擎,以生活为动力进行综合性的非遗实践。保护区通过比赛、节庆和展览展示等方式,塑造和推广热贡文化品牌。如“最大规模的唐卡展示”“最多人同时画唐卡”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吸引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提升了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品牌建设的影响力。同时,在保护区品牌建设中,坚

持热贡艺术内在品质生产上的质量提升,扩大热贡艺术在国内外的广泛交流活动,以务实灵活的发展方式,使热贡艺术面向更多欣赏者。在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同仁的五屯、年都乎、尕沙日、郭玛日等藏族、土族聚居村的唐卡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发展,从而带动了这里的堆绣、泥塑、壁画、木石砖雕、金银铜雕、沙盘画、酥油花、建筑彩绘等手工制作技艺的发展。热贡文化产业被青海省质监局认定为“青海名牌”。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扶贫,就必须实现非遗产品的市场化,使消费者认可、接受和欣赏其艺术的美。以非遗为核心的品牌驱动模式既为广大传承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为其开拓了创作视野,推动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内非遗的多渠道传承和呈现,形成了可以生产的非遗类型的产业集聚、升级,实现了品牌效应。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立足于系统性、整体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的特色文化产业和文化活动,符合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生活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就是民众生活质量提升、文化保护的整体性建设过程,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抢救、保护和利用均是从不同方面对民族地区进行扶贫,以此增加其脱贫致富的渠道,提高民众生活质量。

### 三、保护传统与摆脱贫困:文化生态保护区深化扶贫实践的行动建议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推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是利用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手艺人凭借自己的手艺养家糊口属于个人性行为。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制造业、工业对于这些手艺人的生存造成严重冲击;同时,民族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这样就使得许多贫困的家庭进一步贫困。为了让民族地区贫困家庭走出贫困,与其他家庭一道共同享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在国家相关扶贫政策指导和支持下,文化生态保护区深化扶贫实践,不断增加民族地方发展的内生能力,利用民族地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生活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贫困人口生活质量,让他们早日摆脱贫困,实现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性保护以及保护区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深化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过程中对于贫困家庭、贫困人口的精心、尽心、精确、精准的帮扶行动。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以特定区域性的生产、生活、文化为核心的特定空间,其核心是保护区生活的人群。因此,深化文化生态保护区能力建设的核心就是人的能力建设。要对以人为中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价值充分挖掘,发现其在当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的特殊意义。比如,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县曲格寺及托叶玛村落的蒙古族就在敖包祭祀仪式上表演藏戏,蒙古族群众祭敖包看藏戏成为日常。演出的藏戏剧目主要是《智美更登》《格萨尔王传》《国王关却邦》和《阿达拉毛》。在托叶玛村演藏戏前要祭敖包,然后在敖包前表演藏戏。河南蒙旗蒙古族演出的藏戏使用藏语,“其藏戏的唱腔,音韵考究,唱词工整,每句七至九字,一丝不苟。其曲调与黄南藏戏和西藏藏戏不同,基本上都是甘南夏河民歌,包括一些热情欢快、轻盈婉转的安多舞蹈音乐,幽雅抒情的安多民间小调,虔诚淡雅的僧曲——‘姜会’(嘉木样上下殿时演奏的音乐)。表演中,由舞者齐唱,角色说唱,以及西藏藏戏中的‘连珠韵白’,如诵唱、民间常用的‘白嘎尔’(近似汉族的韵数来宝)。”<sup>①</sup> 非物质文化生活的共

<sup>①</sup> 曹娅丽、刘志群、阿旺旦增《藏地诗颂:青藏高原藏戏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338页。

享在热贡建构了和谐共存的文化局面,也是多民族共有家园的文化资源、精神资源,因此,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得到保护,使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得到彰显,实现文化生态保护区内在价值的能力建设,确保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体生活实践。

文化生态保护区关于人的能力建设主要是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能力建设,在抓各级、各类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能力建设上下功夫、做文章,让传承人在村落、社区、群体中对民众熟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进行合理利用,实现创造财富,发挥引领、带头作用,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创造性转化。

文化生态保护区设立、建设内涵及其目标应该让更多人去理解,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认知以及整体性的生活关系、文化关系应该加强讨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研培研习,有针对性、有目的地进行课堂教学和田野实践,增加传承人对于非遗的历史传统、当代状况的了解,增进传承人之间、传承人与外界的交往交流;始终贯彻“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的目标原则,切实提升传承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使一些生活在民族边远地区的民众在学习中提升技能,在学习中帮助更多的人,从而激发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能动性。

“在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内,应当建设综合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所,根据当地实际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馆,根据传习需要设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习所或传习点。鼓励将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元素或符号运用在当地城乡规划和设施建设中。”<sup>①</sup>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整体性的区域空间和民众生活实践,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该区域的社会建设能够更好地融为一体,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力,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发展和利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区域空间不是一个物理性的空间,而是生活空间,其中包含人的生活内容。比如,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文化空间概念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热贡,即元、明、清时期政教合一制度下的热贡十二个部落,包括青海循化、尖扎、泽库、贵德、同德和贵南等地部分地区和甘肃甘南州夏河县部分区域。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就充分尊重了文化生态的文化脉络、活态分布、遗产联系,也充分尊重了传统意义的文化区域格局。这样的保护规划既形成了文化区域之间的共建共享机制,也突破了各县域文化旅游资源管理各自为政的传统范式。对重点地域、文化辐射和关联区域进行不同的县域定位,明确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的分工任务及功能属性。<sup>②</sup>该区域内生活的藏、汉、蒙古、撒拉、土、保安、回等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这样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就有了生活情感的温度,有了社会历史的深度,其空间禀赋就带有资本价值属性。

文化生态保护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历史立场来看,均具有资本属性的价值呈现,有的是内在的、精神的,有的是外化的、物质性的。于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本价值就存在明显的差异。对此,我们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进行辨析,精准挖掘那些与当代社会结合紧密的资本属性,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产品,实施创造性转化,创造出文化生态保护区特色性的文化品牌,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质量。同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其实在推进以

<sup>①</sup>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第1号,2018年12月10日。

<sup>②</sup> 索南旺杰《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的地方范本——以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非遗为中心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此实现非遗改善民众的生活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因此,加强对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非遗小镇、非遗产品一条街、非遗融入古村落保护等建设,能够极大提升当地民众生活的幸福感。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尽管是整体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保护,但是,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具体人生活实践的产物,对于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尊重其传统性,“人从‘彼岸’被召回回到精神面前;大地和它的物体,人的美德和伦常,它自己的心灵和自己的良知,开始成为对他有价值的东西。”<sup>①</sup>我们应该严格秉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16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其保护传承以传统为核心,对其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利用,从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众生活改善双翼齐飞,这就需要在保护区建设中特别关注那些生活贫困的家庭、人群,帮助他们利用祖先留下的文化财富、自己熟悉的文化开展创收增收活动。当然,要实现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双翼齐飞,需要政府、民众、新闻媒体及其他社会各界的齐心协力,共同推动,从不同的立场、角色权力上积极参与。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对于其所在的民族地区的扶贫是精准的,我国公布的三区三州<sup>②</sup>许多不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内,但是同样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的精准扶贫方法应该大力推广,充分发挥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 四、结语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式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不仅是新时代文化保护实践方法,也是新时代中国文化知识生产的方法。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距今已有十四年的历程,其传统文化保护的新方式、文化生产的新路径离不开政府主导、民众广泛参与,以及专家学者的学术支持。

新时代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民族地区扶贫模式理应把握新时代民众生活与传播方式的需要。互联网扶贫模式的动力源于非遗传播,这种传播通过远距离参与的方式开展,互联网直播打破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场景建构模式,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距离、生产场景以及生产行为等方面被解构重组,形成全新式沟通交往方式,这就使非遗传承人与受众实现了远距离参与、互动,亦使许多传承在固定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起更多人群、更大范围的关注。挖掘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本价值,有助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发展。

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和保护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可以增强保护区人民的文化自信。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应充分发挥生态环境自然禀赋的优势,蓄势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创新,赋予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能量,激活潜在力量,致力建设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走出一条既让民族文化大放异彩又让更多贫困群众共奔小康的新路子。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76页。

② “三区三州”具体指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涉藏市县及南疆的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地区。“三州”是指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三区三州”是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

当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也应“在提高中保护”,在现代生活理念下,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建设回归生活,在当代生产生活中再现活力,巩固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成果,丰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精准扶贫模式,形塑文化生态保护区“共享空间”和“生态空间”,形成富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坚持文化生态保护区内民众互尊互信、包容互惠的传承观、发展观和创新观。

## Research o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 Pat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Ethnic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ecological Reserves Construction

LIN Jifu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23 cultural-ecological reserves (experimental areas), which mainly implement overall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11 of them are in ethnic regions. Being rich and diverse, and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cultural-ecological reserves in ethnic regions is a precious resource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se regions. The goals of constructing cultural-ecological reserves include activating the reg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gions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 From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th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ctivities for improving poverty-stricken regions and poor families, an effec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 path has been formed to the effec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ecological reserves has been greatly promot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en effectively protected,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thnic regions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external promotion to self-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us having blazed the contemporary path for people in ethnic regions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move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ethnic regio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ecological reserves; poverty alleviation

责任编辑:毕曼